



内蒙古
当代文学丛

汪浙成 温小钰 小说选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内蒙古当代文学丛书

汪浙成 温小钰小说选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Qa218/04

内蒙古自治区当代文学丛书

编辑委员会名单

主任委员

乌 恩

副主任委员

刘云山 苏尔塔拉图 扎拉嘎胡

委 员

云照光 珠 岚 敖德斯尔 安柯钦夫

葛日乐朝克图 焦雪岱 巴·布林贝赫

孟和博彦 张志彤 张长弓 拉布坦

占布拉 李可达 曹都必力格 丹必扎拉

森 齐·莫尔根 时家翎

Wang Zhe Cheng Wen Xiao Yu Xiao Shuo Xuan

汪 浙 成 温小钰 小 说 选

内蒙古当代文学丛书编委会 编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25 字数:300千 插页:5

1985年1月第一版 1986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统一书号:10089·348 每册:2.55元



汪浙成 温小钰近影

作者小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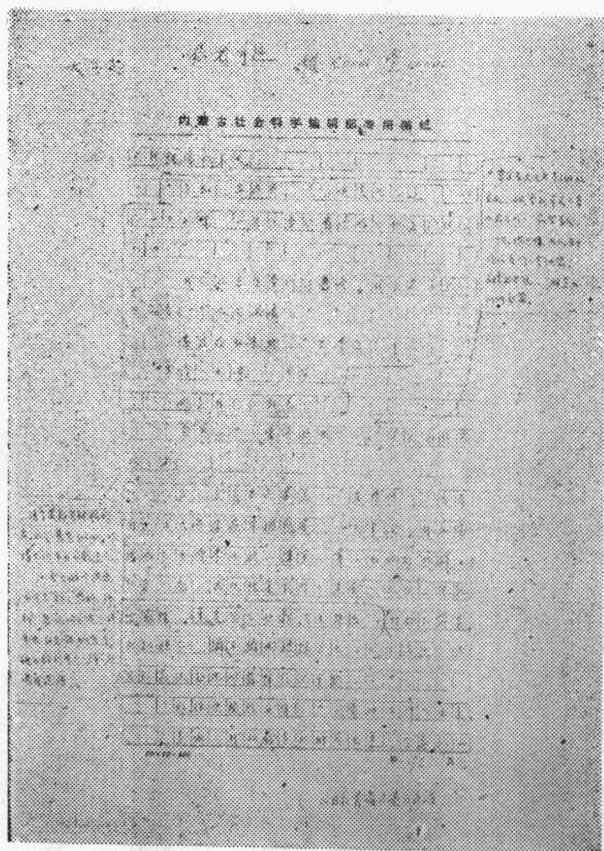
汪浙成，男，现年四十八岁，出生于浙江杭州。抗日战争的连天烽火中，在浙东乡野渔村的辗转流徙中度过童年时代。解放后，在宁波奉化结束了中学的学业。一九五八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分配到内蒙古工作。长时间担任内蒙古《草原》文学月刊社编辑、编辑组长。业余从事文学评论和创作。一九八二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同年五月，调内蒙古作协分会搞专业创作。

汪浙成从求学时代开始发表作品，主要是诗和古典诗歌的论文。参加工作以后，广漠的内蒙古草原、森林、沙漠、牧场扩大了他的视野，从一九六二年开始从事小说和散文写作。

温小钰，女，现年四十六岁，浙江杭州人。抗日战争时期，举家随父亲所在的铁路局撤往大后方。整个小学和中学时代是在风景秀美的滇南小镇和四季如春的昆明度过。一九六〇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分配到内蒙古大学任教，现是该校中文系副教授，全国作家协会理事。

温小钰是从戏剧创作开始走上文学道路。在学生时代发表过一个独幕剧和一个四幕七场大型话剧（主要执笔者之一）。一九六二年开始进行小说和散文创作。

二十多年来，汪浙成和温小钰或合作，或单写，先后出版了《第三碗奶酒》、《大兴安岭人》、《土壤》、《别了，蓼藜》和《草原蜜》等单行本。温小钰还从事文学翻译工作，出版和发表过一些英语作家的长篇和短篇译作。他们合作的中篇小说《土壤》和《苦夏》，曾分别荣获全国第一届（一九七七—一九八〇年）和第二届（一九八一—一九八二年）优秀中篇小说奖。



作者手迹

出版说明

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暨内蒙古自治区建立四十周年编辑出版的这套《内蒙古当代文学丛书》，是迄今对内蒙古文学发展的一次最大检阅，是展现内蒙古四十年来文学创作成果的大观，是向这两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节日的隆重献礼。

四十年，只是历史的一瞬，而对内蒙古的文学事业来说，则忠实地记录着一个开创性的崭新时代。内蒙古是我国最早实现民族区域自治的民族自治区。她在一九四七年五月一日成立以来，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内蒙古各族人民不仅在政治上实现了当家做主，而且在经济上、文化上正在逐步摆脱贫困和落后状态。伴随着自治区社会主义建设各项事业的飞速发展，在文学创作上也取得了显著成绩，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喜人景象，产生了一支由蒙、汉、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回、满等各兄弟民族作者组成的文学队伍，出现了一大批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及反映各个历史时期生活和斗争的优秀作品，并以其独特的民族特点与地区特色，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好评，在国内外产生了一定影响。

列入《内蒙古当代文学丛书》的蒙汉文作品，分别用两种文字出版。其作者，既有驰誉国内外的文坛老将，也有成绩卓著的中青年作家，还有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会以后涌现出的艺苑新秀。丛书计六十余部，可以说是我区文学精华的荟萃。丛书所展现的壮观阵容，不仅可以载入内蒙古的文学史册，同时，也将在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百花园中放出瑰丽的光彩。

出版这套丛书，对繁荣发展我区的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具有很大意义。在党的领导下，内蒙古的文学事业，必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开创出空前繁荣的新局面。内蒙古的各民族作家将以更多更好的文学作品，为建设四化，振兴中华，为伟大祖国的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繁荣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

目 录

第 一 辑

- 3 小站
- 16 白云之歌
- 31 积蓄
- 51 错位的扣子
- 68 宝贝

第 二 辑

- 87 土壤
- 280 苦夏
- 334 白花苜蓿之蜜

第一辑

小 站

我从小就梦想着当一个火车站长：穿着笔挺的制服，在明亮而宽敞的月台上来回走，在嘈杂的喧嚣声中用权威的态度发号施令。而这一切中最迷人的，便是指挥那巨大的火车头。如果站长不发给路签，那么这个大怪物就哪儿也甭想去，可是只要他把小绿旗一挥呀，瞧吧，不管它跑得多累，也得乖乖地“是啦”一声，开动起来。

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于站长的职务我自然有了更多的了解。我了解到他们的工作绝不只是走来走去挥挥旗子而已，他们有许多麻烦事要做：客运啦，货运啦，调度啦，各种表报啦……但这些麻烦都不足以打退我的热情，相反，更显出了这个职业的重要性。

我的梦想终于实现了。铁路学校毕业以后，上级派我去京包线上工作。地点，叫小站。

全家兴高采烈地为我饯行，只有妈妈发开了愁：“小站？这算个什么地方？连个官名都没有，往后可叫我上哪儿找你去呢？在那个没名没姓的小地方，哪一个姑娘会嫁给你啊！”

而地名对于我来说是无所谓的。在我们辽阔的国土上，象小站这样平平凡凡的，叫不出什么有特色的名字来的地方还少吗？重要的不在于名字，重要的在于：我是以一个见习站长的身份给

派去的，不平凡的事业在等着我；同志们将兴高采烈地迎接我，我就要开始过那种从小就向往的轰轰烈烈的生活了。

我在细雨濛濛的深夜里到达了目的地。这可真是个名符其实的小地方，连慢车在这儿也只停两分钟。我颤颤地提着大藤箱，刚一下车，火车便急促地尖叫一声，又向苍茫的原野驶去，把我一个人留在黑暗、潮湿的站台上了。

在雨色中，站上显得很凄凉，没有什么人在这儿下车；没有月台，没有灯柱，也没有花圃，只有一幢刷着白粉的小砖房，同样刷着白粉的栅栏，象小房的两只胳膊，无可奈何地伸展着。

我在黑暗中站了一会儿，没有发现接待我的人，就只好自己提起沉重的藤箱向孤零零的小屋走去。

从西边，有一个人打着手电向我走来，手电的光晃得很厉害。我看见他不时蹲下来，仔细审视着道岔和路基。他走近了我，大声问道：“赶脱了车还是下错了站？”手电的光柱朝我脸上直射过来。我被他这种不礼貌的举动弄得有点恼火，举起手遮住眼睛，不悦地回答：“我是来这儿工作的。”

“哦？”来者很惊奇，又举起电棒，从上到下照了我一遍，停留在那只大藤箱上，“来吧！”就一颠踵一颠踵地领我走去。

我跟他进了办公室，这才发现在我面前站着的是一个和小站同样单薄而瘦小的老人，他身上裹着件肥大的雨衣，下襟上沾满了泥，一条腿微微短了一些，踮着脚尖，费劲地站着。他并不马上请我坐下，径直走到桌边，抓起电话筒，向什么人报告起道路的情况来。

等他打完电话，我便开口问他：“站长睡了吧？”

他没理会我的问题，却歪着头，严肃地眯缝起眼睛，看起我来。

我被他看得很窘，手也不知道往哪儿放好，好象我犯了什么过错似的。我满以为一到地方人家就会好好招待我一番，谁料到会

出现这样不友好的局面？

我赶快打破沉默，重复说：“我想找站长同志。”

“听见了。”老人简短地回答，“你是自愿来这儿的？”

这简直是废话！难道我是被谁捺着脖子赶来的不成？看见我那大受侮辱的脸色，老人微微笑了：“那好，你先休息，就暂时住在这儿。”他推开了门，原来里面还有一间屋，屋角空着一张铺好的床。

等我醒来的时候，屋子里已经满是阳光，站台上腾起一片喧闹的声响：机车呼嗤呼嗤地喘着，手推车隆隆地响着，哨声，电话铃声，妇女们的召唤声，哒哒的脚步声……听到这种久已向往的生活的交响乐，我高兴起来，一翻身下了床。

就在这时，门开了，走进来一个宽肩膀的男人，他一见我就象老朋友一样爽朗地笑起来：“睡得好香，是干咱们这一行的料！”望见我惊愕的脸色，他走过来，热情地抓住我的手，说：

“来，咱们认识认识，我叫老周。你昨天半夜才到，我们谁也不知道，也没来接你，淋着雨了吧？”

他招呼我盥洗，然后，象魔术师似的揭开了办公桌上的一张报纸，于是一大碗黄澄澄的小米粥和一碟红殷殷的酱豆腐便呈现在我眼前，小米粥还冒着热气。他跟我说：“瞧！老站长给你准备了多带劲的早饭！这酱豆腐还是我去天津时给他捎来的，他一直也没舍得吃啊。”

“老站长？！”

“就是昨天在站上接你的刘富同志，你们不是已经认识了吗？”

“他？！”我越发惊愕了，眼前的东西怎么也不能和昨天那个冷淡、古板的老头儿联系起来。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我还当他是养路工呢。连介绍信也没给他看。”

老周打雷一样哄笑起来：“哦，把他当巡路工了，这是他的

老规矩：一下雨就往外跑。咱们这段是国民党反动派留下的老路基，好些地方不合工程的规格，特别是西边有个大拐弯，一下雨，附近山上的山洪爆发，常有洪水断路的危险，严重了，冲垮路基，就得几天通不了车。眼下国家新建的事业这么多，一时还顾不过来，这就得靠我们自己多加小心罗……喂，你喝粥，喝粥。”

这时，门忽然又开了，老站长气喘吁吁，一颠踮一颠踮地奔进来，在最下一格抽屉里掏摸了半天，拿出一条垫肩的麻布。老周拦住了他：“怎么啦？”

“搬运工人手不够，货卸不下来，要误点了。”

我忙跳了起来，喊了声：“我去！”从老站长手里抢过麻布就跑出了站房。

在最初一个月里，我的确没有轻视自己的工作，我就兢兢业业地坚守在岗位上。在那些漆黑的下雨的夜里，我披着胶布雨衣，站在泥泞的路基边，检看上下旅客的车票，然后，高高地擎起绿色的信号灯，让火车从我身边疾驶而过。

但是随着日月的飞逝，我却苦恼起来，我的心境就象今年这个迟到的雨季的天空，沉闷的雨云慢慢堆积起来，堆积起来……我们这儿实在太单调了。

站上一共十六个人，十六个人要分成三班，与我经常碰面的人便非常少了。售票员她们是女同志，总是谈论着一些男子们摸不着头脑的事情，老周是车务段长，同我关系不大；扳道员们整天守在几十公尺以外的小房子里，很少有和他们讲话的机会；站务员兼管货运的老洪，倒是一个快活的家伙，可以整天无缘无故的嘻笑着，兴高采烈地吆喝着。此外，他就只喜欢在耳机子里听相声，哼哼评剧《刘巧儿》，仿佛对生活没有更多的要求了。剩下的便是闹嚷嚷的旅客和一刻不停的电话铃声。这些上车下车的公社社员，常常背着沉重的麻袋包推门进来找水喝，或是借火抽

烟，我得回答他们的各种询问，倾听他们漫无边际的闲扯：土豆的收成啦，谁家新买的飞鸽自行车啦，新选的队伍会计啦，去年劳动日的工值哪小队最高啦……或者拿着介绍信要我在满员的列车上为他们搞一张车票。然而所有这些人，都是要乘火车时才上我们这儿来，一上了火车，就马上把我们忘得精光，又用同样的兴致和新结识的旅伴们大聊特聊起来。

那么，唯一和我朝夕相处的人就是老站长了。

初来时，我觉得他是一个内热外凉的暖瓶胆子，手脚比嘴巴勤快得多，整天在站上劳累：打扫站台，搬运货物，回答旅客的各种问题，或者，走到售票口前，叫旅客一个个排好队，这一切，他都做得津津有味。有时他也给我这个新上任的见习站长反复讲解值班员的“五要五不要”，孜孜不倦地看我接发车时的操作程序，验看远方信号旗，而且总是站在我身后，严峻地注视我挥动绿旗。

日子久了，我慢慢觉得他平板、乏味，好吹毛求疵。我受不了他那股挑剔、噜苏劲儿，他在鸡毛蒜皮的小事上花费了多少精力啊！往往，他自己站上的事儿管得还不够，还要管到别人头上。譬如说，他干嘛把司炉们叫过来，为了耗煤问题把他们“抱怨”一顿呢？这些事与我们这个小站有什么相干呢？是啊，我和他在年龄上是相差两代的人。理智上，我可以敬重他，站上的人也都敬重他，然而感情上，我却不喜欢他，不亲近他，每当我看见他吃力地、一颠踮一颠踮地跨过轨道去做那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时，心里便涌起一股又一股可怜、又轻蔑的感觉。

日常生活也使我厌倦，每天都一样，白天、黑夜、上班、下班、吃饭、睡觉，象火车过站一样准时运行。站房四周是一片沙地，最近的村落离这儿也有四、五里地，永远也不必期待会有什么新鲜事发生。唯一让大家开心的一件事，便是107号司机和女售票员的恋爱。每当我在粉板上记下机车号数“胜利2374”

时，老洪他们就挤眉弄眼地嬉笑起来。女售票员呢，照例满脸通红，头弯得低低地坐在售票处前，显出特别专心于工作的样子。

“胜利2374”进站了，随着路签，107（在铁路上这三个号码念作“么洞拐”）会扔下一个包包来，包里有时是一个小本子，有时是一块手绢儿或一对发夹。我们自然很乐意做他们的义务传递员。107眼巴巴地朝售票的小窗口望着、望着，盼望女售票员露露面，或者通过别的方式给她打个招呼。可是，只有两分钟，绿旗扬起来了，停车时间过了，107叹了口气，拉响汽笛，又朝远方奔去，那汽笛声好象也在叹息似的。瞧，在我们这个小站上，就连谈恋爱也不象我们想象中的和小说里读过的那样畅快和富有情趣。

最主要的是工作叫我失望。永远是那些短促的停车，永远是那些匆匆忙忙的旅客和吵人热昏的电话铃声：壁上的电话铃声音尖亮，桌上的电话铃声音粗浊。粗浊的声音一叫，是段上来了指示或催什么表报：如货源调查表啦，旅客流动月报表啦，都是小学毕业就能够做的事情，尖亮的声音一叫，是一列火车开过来，于是我就得对着话筒大声叫喊：“同意闭塞”啦，“开放信号”啦，“开放完毕”啦……象一架机器一样地做着一道道接发车的工序，并且在一块接发操作顺序表的小黑板上画白道，每完成一个程序就画上一道，直到送走一趟车，刚刚画满黑板的白道道又得擦掉。我的工作就象这块黑板一样：划了擦、擦了划，留不下任何痕迹。至于我曾梦想过的指挥巨大火车头的欢乐，在这里也完全体味不到。那些快车和毋需在这里等错轨的货车，总是目中无人地从我们这里疾驶而过，闪一闪就把我们给扔下了。我只有委屈而无奈地举着绿旗，望着它们骄傲地远去，远去。

记事牌上安全通车的日数就这样增加着：第395天，第396天，就要到达第400天了。

一件小事把我这已经绷紧的忍耐之弦给最后扯断了。